

治理天价彩礼，要从思想观念破题

□□ 侯馨远 李婧

近日笔者与老乡聊天，谈及其儿子结婚所需花销，老乡吐出一肚子苦水：“彩礼30万元，房子、车子、金首饰另算，加起来至少50万元。这还只是一个儿子的结婚开销。”据老乡反映，如此超出一般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结婚花销，在当地很普遍。如果拿不出20至30万元的彩礼，青年男子就很难讨到媳妇。并且近些年来，当地彩礼金额还呈上升趋势。

一直以来，农村地区的天价彩礼广受诟病，青年苦恼婚娶，家庭债台高筑。有时因为彩礼价格谈不拢，双方家庭结怨，挑战着农村社会的公序良俗与和谐稳定，令人扼腕痛惜。事实上，针对天价彩礼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在探索破解之道。村规民约上墙，红白理事会等开始发挥作用，还出现了嫁女少要乃至不要彩礼的典型。不过也要承认，一些地方的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还是“涛声依旧”，抓一抓好一阵，放一放又反弹回潮甚至愈演愈烈。天价彩礼的顽固性，与其植根的社会土壤密切相关。

首先不能否认的是，从传统视角来看，彩礼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合理性。一方面，它是双方确定婚姻关系的见证、互相吐露情感的媒介；另一方面，在从夫居的传统习俗背景下，彩礼是对女方家庭的一种公平补偿和经济保障。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彩礼原初的功能意涵呈现逐渐消解之势，转而被婚姻市场竞价、攀比心理助推等因素影响裹挟。彩礼“一路飙升”的背后，既有结构性的社会客观因素，也有社会观念与心理等主观因素。过去长期以来，受“养儿防老”“传宗接



破解天价彩礼之困，既要解决实际问题，又要促进观念更新；既不能“一刀切”否认彩礼风俗的传统功能，也要挤出受攀比、“怕吃亏”等心理影响而产生的“水分”，让彩礼回归本源、回归质朴，回归农村家庭可以承受的正常范围。

代”等传统观念影响，农村地区有着较为明显的男孩生育偏好。加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叠加影响，加剧了农村地区家庭对新生儿的性别选择。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地区适婚男女比例的结构性失衡也就显现出来，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状况客观存在。同时，囿于“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模式，女方往往更倾向嫁入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比其原生家庭积淀更为深厚的男方家庭。婚配选择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城市剩女”与“农村光棍”现象并存，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边远乡村中，适婚男性之间的竞争压力。既然“女子不嫁”，女方家庭在彩礼问题上的“议价”资本显然更胜一筹，助推了彩礼价格高企。此外，在一些农村地区的婚介市场，还存在媒人哄抬彩礼价格从中牟利的乱象，这更为天价彩礼“高烧不退”雪上加霜。

除了婚姻市场竞价使然，攀比、“怕吃亏”等心理与观念，又进一步固化甚至助涨了天价彩礼。笔者听到的村民普遍想法包括：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多要点彩礼，将来的养老钱能保障么？既然女子要得多也不愁嫁，为啥不趁机“捞一笔”？其他人人家都是高彩礼，我家少要岂不吃哑巴

亏，遭人笑话？如果彩礼要得低，女儿将来会不会缺乏经济保障，或因为“便宜”而不受重视？……凡此种种，十分现实又浸透些许冰冷与无奈，于情于理似乎都具有一定合理性。这给找到破解天价彩礼的突破口，带来不小思想观念方面的阻碍。

那么，面对天价彩礼，我们真的束手无策么？笔者以为，也不必悲观。天价彩礼固然有其思想观念的顽固性和绕不开的现实根源，但其所引发的“结婚难”“因婚致贫”等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百姓“苦天价彩礼已久而求易俗”的呼声很高。我们既有必要、亦有基础做出改变。

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女性对原生家庭经济情感照料的增多，彩礼补偿女方家庭生存保障的刚需作用，正在逐渐弱化。这就让个体与家庭在商议彩礼数额时，实际上有了更多依靠主观能动性、自主选择的空间。换言之，彩礼要高要低，很多时候并非“生活所迫”，而是“跟风随流”。一番面红耳赤的讨价还价后，表面是得了保障、免了吃亏、占了便宜，实则失了体面、伤了和气、坏了感情。长远看来，未必利于小两口乃至双方父母家庭的稳定幸福。因此我们也看到，在索要天价彩礼这个问题上，即使在农村地区也并

非“铁板一块”。即使当地普遍彩礼很高，也有人为了双方家庭和睦和新人长远幸福，而放弃索要高价。这就是个人观念与能动选择的力量。

所以，破解天价彩礼之困，既要解决实际问题，又要促进观念更新；既不能“一刀切”否认彩礼风俗的传统功能，也要挤出受攀比、“怕吃亏”等心理影响而产生的“水分”，让彩礼回归本源、回归质朴，回归农村家庭可以承受的正常范围。

相关部门与组织要帮助农村大龄青年解决现实问题，如提高致富技能、拓展交友渠道、增加低成本婚恋服务供给。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引导广大村民树立正确婚姻与家庭观，治理手段要柔，约束措施要硬，激励方式要实。强化针对性宣传，把社会氛围提起来，做到“好人事有人夸、歪风邪气有人抓”，引导村民契约等真正发挥作用，避免破窗效应。同时，要想方设法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天价彩礼治理的积极性，把道理讲清、利害摆明，尊重群众意见，发挥群众组织作用，放手让群众自我管理与监督。在此过程中，特别要调动起农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要求他们带头示范，为良俗形成破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持续推进男女平等、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等治本之策，亦很关键。对天价彩礼的治理，需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在多方合力下，促成思想自觉、制度规范、风气良好的常态化。到那时，相信我们收获的将不只是婚俗新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都会更为正向醇厚，每个人的幸福感也会更加饱满持久。

要把“道德信贷”好事做好

□□ 杨瑞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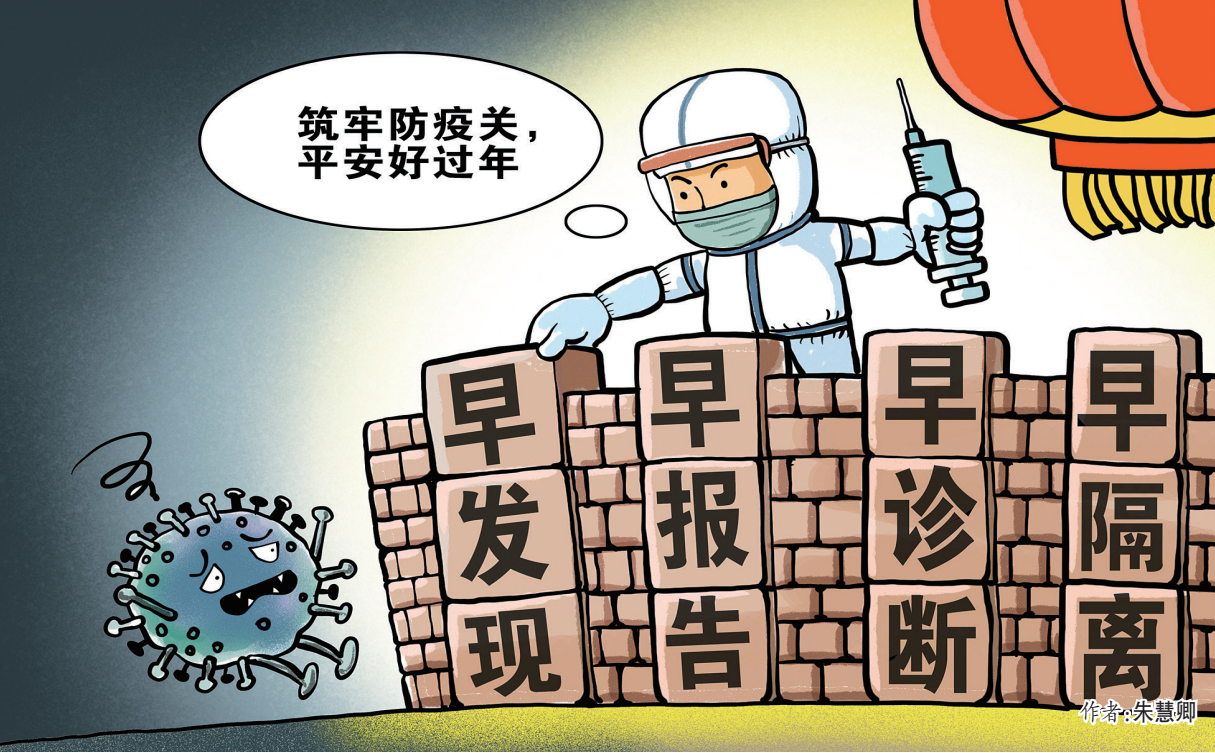
近年来，甘肃、湖北、安徽等多地在农村地区创新实践，探索实施“以文明作担保，以诚信作抵押”的“道德信贷”工程。道德模范、星级文明户、身边好人等有德者，无需物质抵押和担保，即可获得相应额度的贷款，并享有更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让有德者“德财兼备”，此举赢来多方点赞！

将道德上的荣誉和解决村民实际生活需要结合起来，让有德者享有更多权益和礼遇，是对传统观念中“好人有好报”的再度诠释，也是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将“虚”功做“实”的有益尝试。由此，推进乡村善治有了切实可行的抓手，不仅能够引导更多村民树立“有德者有得”的鲜明价值导向，还能鼓励更多人做好事、当好人。

需要注意的是，“道德信贷”毕竟是个新事物，如何保障道德评议的公平公正，如何完善有德者的评价维度，如何健全监督体系等问题，都关系到这项创新举措的实际运行效果。因此，各地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机制、总结经验，切实将好事做好。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2022年寅虎春节将至。能否平平安安与家人相聚过节，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平安过节的前提，是筑牢防疫关，绷紧防疫“安全弦”。

春节期间人流物流增大，人员聚集增多，给疫情防控带来重大考验。筑牢防疫关，要坚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四早原则，及时采取阻断措施，科学精准处置疫情；要坚持守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社会“防线”，各部门、各环节密切配合、有机衔接；要千方百计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统筹好疫情防控不减压与人民群众过安全放心年的关系，把刚性规定与柔性执法结合起来。

这正是：

辞旧迎新虎年临，防疫之弦莫松劲。

内外“防线”需严密，四早原则心间记。

文@向北风

村急救小屋医生：既做急救员，也做指导员

□□ 严国进

汝城县人民医院共建村级急救小屋。随着沙洲村急救小屋的启用，该省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急救体系正在形成。村急救小屋配置有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模型及教学器具，由沙洲村卫生室医师进行日常管理，县人民医院培训师定期前来开展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创伤四项等急救知识。

基层医生不懂急救、不会急救，就不是一名称职医生。笔者认为，基层医生还要强化对辖区村民、师生的急救宣传教育与指导。笔者期盼，各地在农村中心村、乡镇能建设更多村级、乡镇级急救小屋，以更好打造最短最优急救服务圈。同时，进一步提升急救培训教育、急救器械配备、急救网络建设等方面水平，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更好守护村民生命健康。

在急救培训教育方面，一是可规定各级医院临床医生，包括基层医生在职称晋升前，应到120轮岗、进修至少半个月，并通过理论和模拟现场急救综合培训考核，把急救技能掌握情况作为职称晋升准入门槛。二是要每年定期加强乡镇医生及乡村医生的基本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如科学处置各种外伤、急腹症、农药中毒、混合气体中毒、急性心肌梗

死、消化道大出血、心脑血管意外、心跳呼吸停止、各种休克等，对每一名基层医生都要手把手地教。三是120急救中心及大中医院急救医生应定期下基层开展结对帮扶，到基层参与现场急救、指导，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至少保证每一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一名合格的急救医生。四是在广泛开展卫生健康下乡活动中，要面对面与村民互动，把真实的人工呼吸、骨折固定等现场急救案例摆在村民面前，手把手教他们救护技能，把急救下乡体现在实际训练之中，从而不断提升村民的自我救护意识与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让更多村民都会出手急救，都能正确急救。五是除了农村中小学自身强化应急救护培训外，各地红十字会牵头组织好应急救护培训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辖区农村中小學生应急救护培训、指导。要不断丰富应急救护培训必修课程内容，在培训过程中，不妨针对各地各校实际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如电视短片、微电影、文化娱乐活动、现场互动、面对面讲授等。同时，结合实际案例，在广大师生中广泛开展急救自救应用知识与技能的播放、讲座、互动、通过耐心讲解与示范，寓教于乐，杜绝照本宣科、口头说教的形式主义，在实际训练中提升培训质效。培训课程结束后，要让

每一名学生依次进行实践操作，如不合格要补学补考，直至学生会学为止。

在急救器械配备方面，应定期为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配备一定品种及数量的急救器械和急救药品，并定期检查更换。应明确规定乡镇、村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配备哪些急救器械（如医用供氧器、自动体外除颤仪、简易吸痰器、铲式担架、夹板等）和急救药品，并规定备存数量。应免费给每位乡村医生配备一个重量轻、体积小、坚固、便于携带的急救包，包内除可配一些常用器材外，还可配备卡式止血带、引流管、胃管、紧急抽吸器、呼吸道插管组合、手动便携式小型负压吸引器及一些急救必备药品。当然，还要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基层医生的急救实战能力。

在急救网络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覆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院前急救网络。120急救中心不妨在农村边远地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设立急救分站，在每一个急救分站投放救护车，并配备齐全急救设施，相应急救人员，从而确保“拉得出，打得响”，真正做到将急救服务向乡村延伸，破解广大农民“看病难、急救更难”的窘境。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各类人才开始向乡村聚集。一方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乡村振兴促进法也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那么，乡村振兴真正的支撑性主体是谁，如何处理本土人才和下乡人才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和理解在乡村共存的多元人才主体？这一系列问题，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必须筹谋和回答的。

乡村振兴可以按照在地农民、返乡能人和下乡市民三类群体，锻造一个新的支撑性主体。

首先，农民世世代代在乡村生活，是乡村的原住民，在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乡村解放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新时代乡村振兴当之无愧的首要主体。其次，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创业或务工的大多数流动人群依然保持着乡村户籍，具有浓烈的乡村文化认同。同时，他们又熟悉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当他们有志于返乡时，可以在城乡之间担任积极的文化使者，架设起沟通的桥梁。最后，由于厌倦城市喧嚣的生活方式，有一部分敏感而有能力的城市市民，愿意来到乡村生产和生活，成为“新村民”。他们的逆向流动，有助于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这三类主体对乡村振兴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其一，仅仅依靠在地农民，他们的生产方式相对传统，视野观念有所局限，资源整合能力也相对不足，很难自觉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未来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二，如果仅仅依靠返乡、下乡人才承担乡村振兴重任，则会带来社会矛盾，不利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接续传承。

从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当前乡村已经呈现出如上三类主体共同生活的局面，当因势利导，加强融合。从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类主体的融合，既可以带来资金、人力和文化等各类资源的融合，还能体现出时代性、前瞻性和未来性。要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将这三类主体锻造成为一个有机新主体。

与此同时，重庆大学潘家恩副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如果说乡村建设的上半场，是通过各类工程、项目和制度的创新探索，为主动下乡和返乡者“打开一扇门”，同时激活乡村种种在地资源，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么也应该对乡村建设的下半场有所预判。未来，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向高质量转变，会出现一批被动返乡者。当他们回到农村时，必要的资源支持和保障必不可少。

如何锻造乡村振兴新的支撑性主体？笔者认为，需要以党建为引领，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虽然新主体是重要的，但新主体不会自觉形成。在未来多元主体共生共荣的乡村场域中，各类主体之间会因为差异化的文化观念、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经济能力等，滋生出多重具体的矛盾，彼此之间相互理解存在障碍。比如，下乡的艺术家想在院子里种草皮，而他的邻居可能会在深夜，悄悄将草皮铲除。前者想要的，是绿色、自然、美丽；后者却可能担忧，种草会给家中招来蛇虫。因此，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体联结，考验着乡村治理的水平，也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败。

党建引领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具体可在群众工作和组织监管两方面着力。党建引领不仅在于宏观层面为乡村人才振兴把好“方向盘”，更在于党建可以超越诸多具体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粘合”。通过开展群众工作，基层党员干部可以了解村庄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具体诉求，更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发起公共议事、协调经济关系、组织文化生活等方式，可以在各类主体之间建立丰富、多元、有生命力的有机联系。比如，新老村民可以是股份合作关系，同时也可以文艺伙伴、邻居、议事组成员、微信朋友圈好友等。如此，会增加处理问题的弹性，有效缓冲各类主体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此外，返乡能人、下乡市民很多时候是作为人才来到村庄的，可加强县委组织人才部门对他们的监管或考核，并以此来规约他们在乡村的行为，引导其尊重在地农民利益。

制度建设是另一个重要方法，包括县域层面的制度创新，以及村庄层面的村规民约实行两方面。可由县委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牵头，进行乡村人才方面的制度建设。如此，不仅可以吸引人才向乡村聚集，回应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难题，而且可以为乡村资源要素探寻与其匹配的市场逻辑，实现产业精准对接，还可以划定红线，规范返乡下乡群体的经济社会行为，引导其不越轨不逾矩。在乡村层面，可以用村级组织或相关民间社会组织的名义，针对垃圾处理、建筑施工、生态环境保护等具体事务，展开讨论并进而达成共识，形成兼顾新老村民共同利益的村规民约。由此，不仅可以焕新乡村精神文明风貌，有利于乡风文明，而且有利于促进具体矛盾解决，锻造新的乡村振兴主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不能放任“云算命”野蛮生长

□□ 杨朝清

只需提供年龄、性别信息，静心冥想一个时间，再在1至78中选3个数字，就可以知道近几个月，感情、事业、学业的走势……如今，操作简单的塔罗牌在线占卜受到一些年轻人追捧，有人将其视作生活“指南针”，更有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故弄玄虚的活术套路、乱花迷眼的营销手段，真实身份和履历无从考证，名气也有不少水分……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占卜师，收费价格也存在千差万别。欺骗性收费、花式营销等乱象层出不穷，消费者权益被侵犯时有发生。原本只是一种娱乐手段的占卜，异化为一些人逐利的工具。那么，原本缺乏科学依据的塔罗牌占卜，为何受到年轻人追捧？

在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的风险社会，部分年轻人存在浮躁、焦虑等不良心态。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年轻人渴望寻找内心慰藉和精神支持。部分年轻人不愿意通过专业心理咨询来走出“心灵的阴霾”，也不愿意寻求或者得不到亲友熟人的关心帮助，便将希望寄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上。被赋予神秘色彩的塔罗牌占卜，便通过“云算命”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提前预知未来”，把握了一些年轻人的“软肋”。

作为“数字原生代”，许多“90后”“00后”

对互联网有着天然的亲近与信任。但是，“云算命”并不能精准测算，只是提供方向性的参考和建议。当占卜师给出了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给前来占卜的人贴上一个标签，年轻人便会自我调节，以贴近这个标签，进而得出“算得准”的判断。而在有效信息供应不足的背景下，“云算命”对受众精神需求的满足，加之受众间“相互印证”的加持，导致人们的认知偏差，让一些人网络占卜深信不疑，形成单向度的价值判断和同质化思维。

说白了，“云算命”本质上就是借助网络平台贩卖焦虑、传播迷信思想，显然须给它戴上“紧箍”。如果放任其潜滋暗长，不仅会破坏网络生态、污浊社会风气，也会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损伤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作为年轻人，应该有笃定的价值信仰、健康的精神追求，如果在生活中遇到压力和困难，要通过合理途径去解决。消费者要多些风险防范意识，避免被“云算命”欺骗。此外，相关部门不能放任“云算命”野蛮生长，要进行更严格的市场监管，对违法违规行及时惩罚制止。愿更多人认识到，美好生活不能依靠占卜，而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去奋斗；与其将幸福寄托在别人口中，还不如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征稿启事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论谈，稿件请勿一稿多投。来稿请发：nmrbpjnglun@163.com